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上册)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著
瓦西里·米特罗欣
王振西 主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第 14 章

政治领域的战争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主题在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除了从事情报搜集和编写政治上正确的情报分析外，克格勃还试图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去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这些措施包括操纵媒体以及不同程度使用暴力手段的“特别行动”等等。受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英勇地挫败反革命阴谋的夸大其辞的描述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希望能够给政治领导层留下一个好印象，克格勃经常过高估计自己的作战效率。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都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和进行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克格勃使用的都是非暴力的“积极措施”——诋毁“主要对手”信誉的“影响行动”。1984年1月举行的国外情报局高级干部会议再次确认了国外情报局的工作重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我们必须锲而不舍地努力揭露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重点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有改变过。许多用“揭露”这一委婉表达方式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A局（国外情报局中负责执行“积极措施”的机构）故意制造的假情报，这些情报通过

克格勃绝密档案

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传达给国外情报站。有人估计,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花在“积极措施”上的时间占他们全部工作时间的25%,虽然,实际上有些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A局编造的假情报在复杂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了它的情报人员素质上的差异。A局中50%的官员是开展“积极措施”的专家,而其余50%的官员中有些人是从其他部门淘汰下来的。国外情报局里最有能力和最有抱负的工作人员几乎都不愿意到A局去工作,因为在A局很少能得到出国工作的机会,而且在A局工作会被视为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当然也有例外。尤里·莫丁(“五杰”的最后一任指导员)就是“积极措施”方面的专家。他在担任了A局副局长后,又被安排到印度从事政治情报工作——负责散布假情报。他的工作非常成功,后来,他被任命为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情报系主任。然而很多A局的官员都不具备或很少具备在西方国家生活的经验,他们对西方的了解都来自拙劣的、关于资本家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阴谋理论,据他们称,这些阴谋家在美国操纵着一个秘密“指挥中心”。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一任克格勃的主席和国外情报局局长在国外工作过,因此他们也都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暗杀。如果中心不把这件事解释成一桩阴谋,那就不完全符合它的特点了。克格勃副主席12月份向中央委员会汇报称:

“波兰朋友(波兰情报局)的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与南方石油产业界有着密切联系的美

克格勃绝密档案

家及多家公司的老板 11 月下旬报告说,这一罪行的真正策划者是美国南方的三个石油巨头——理查森、默奇森和亨特,这些南方石油资源的主要所有者一直与南方亲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组织有联系。”

要找到支持这一过于简单化的阴谋理论的旁证,特别是要寻找石油巨头和反共小丑 H·L·亨特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并不是件难事。亨特曾荒谬地宣称:“共产主义分子根本不需要进攻美国,在美国,亲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比当年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夺取俄国政权时还强烈。”

亨特的儿子邦克是一位右翼分离主义分子,他和其他一些右翼分离主义分子花钱在肯尼迪来访的当天在达拉斯《晨报》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指责肯尼迪是共产党的帮凶,这一指责促使肯尼迪说出了“我正在走向坚果(疯子)之国”这一名言。达拉斯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杰克·鲁比——就是他在 11 月 24 日开枪给了奥斯瓦尔德致命一击——曾在肯尼迪遇刺前不久去拜访过亨特。

克格勃的报告称,《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个记者“在 12 月初私下里说,现已被拘捕的杰克·鲁比曾答应给奥斯瓦尔德付一大笔钱让他去暗杀肯尼迪。而鲁比本人又是受一个由百万富翁亨特领导的、由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家组成的组织的派遣”,后来鲁比又杀了奥斯瓦尔德灭口。看起来赫鲁晓夫也相信了克格勃的观点,认为行刺肯尼迪事件的幕后右翼阴谋家的目的是要使冷战升级,并且“强化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动和侵略成分”。

克格勃相信选择奥斯瓦尔德去刺杀肯尼迪是为了把公众注意力从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石油巨头身上引开,使这一行刺事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件看上去更像共产党的阴谋。中心希望洗脱奥斯瓦尔德谋杀的罪名当然有它自己充足的理由。以下这些事实令克格勃不得不感到非常尴尬：1959年奥斯瓦尔德曾叛逃到苏联，声称自己厌恶美国的生活方式、向往苏联制度，这件事给中心带来了很大麻烦。起初，克格勃曾经怀疑他可能是中央情报局派来执行秘密任务的，但最后得出结论他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摇摆不定的家伙。1962年他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得克萨斯，克格勃很庆幸自己摆脱了一件麻烦。他刚回到美国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也曾怀疑他是克格勃间谍，但很快也得出了与中心相同的带有偏见的结论。然而当1963年8月，奥斯瓦尔德给美国共产党写信询问继续以“地下”成员身份同“反对改革的力量”做斗争是否比以公开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持者身份出现更好时，克格勃对他又产生了怀疑。美国共产党与克格勃的主要联系渠道、美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杰克·蔡尔兹（代号马拉特）警告莫斯科，奥斯瓦尔德的这封信“应该被视为联邦调查局的阴谋”。然而克格勃不知道蔡尔兹自己才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这使得他的这一警告极具讽刺意味。

由林登·B·约翰逊总统任命的对肯尼迪遇刺事件进行调查的沃伦委员会在1964年9月汇报说，它已经掌握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奥斯瓦尔德行刺肯尼迪完全是个人行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虽然报告中也存在着疑点，但是它的主要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A局却深信肯尼迪是右翼势力阴谋的牺牲品，甚至在沃伦报告出台前它就已经成功地策划了第一套反击材料。出版这一材料的是卡尔·奥尔多·马尔扎尼（代号诺德），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被发展为苏联间谍了。克格勃经常利用他实施积极措施。20世纪60年代初，纽约情报站向中心建议给马

克格勃绝密档案

尔扎尼提供 6000—7000 美元,帮助他的“自由书社”继续出版亲苏的书籍:

诺德是个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对交给他的任务相当负责。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可他还是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北方”出版公司(自由书社的出版公司)的运转。“北方”出版公司及其商业销售网络——罗米修书社,已经创办了 14 年。在此期间,它总共出版并销售了 200 多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作者撰写的具有进步色彩的书籍。“北方”出版公司的出版书目上大约有 50 部作品。普罗米修书社有 7000 名会员,另外它还给 8000 余户个别购书者送书。

这些描述显然打动了中央委员会国际部。1960 年 5 月,国际部批准了一笔高达 1.5 万美元的秘密资金,这个数目比纽约情报站建议的两倍还多。

马尔扎尼在 60 年代出版的作品包括他自己翻译的意大利共产党撰写的一篇热情讴歌苏联制度的作品:

加深对苏联的理解是每个社会主义者、每个民主人士和每个现代人的责任……今天我们有能力去不断地改变这个世界,这应该归功于苏联的成功,归功于其他一系列国家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出的斗争。我们有能力,也一定会把 1917 年 10 月诞生的文明发扬光大。

1961 年 9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决定在以后的两年

克格勃绝密档案

里拨给马尔扎尼 5.5 万美元 ,用于拓展其出版业务。此外马尔扎尼每年都得到 1 万美元用来支付广告费用。 60 年代初期 ,年轻的克格勃官员奥列格·卡卢金——他于 60 年代初以莫斯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被派驻纽约——第一次参加了马尔扎尼的招待会 ,他发现在马尔扎尼公寓里 “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克格勃间谍——当然 ,这些人全都被在场的联邦调查局密探监视着。 ”

1964 年马尔扎尼出版的作品中有一本叫 《奥斯瓦尔德·刺客还是替罪羊》 这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本反映肯尼迪遇刺的书籍 ,作者是德国的约阿希姆·约斯滕。在书开头 ,约斯滕表达了自己对卡尔·马尔扎尼“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称马尔扎尼是“一个精明、高效、且具有美国最优秀传统的出版商 ,他对本书倾注了全部心力”。马尔扎尼在接到这部书的手稿后仅用了五个星期就使这本书成功问世了。约斯滕支持莫斯科的论调 ,谴责这次暗杀行动是以“石油巨头亨特为首”的右翼种族主义分子策划的阴谋 :

由于肯尼迪先生签署了“核禁试条约”、在老挝问题上采取了中立态度、憎恶拉美军国主义分子 ,并对卡斯特罗发出和解试探 ,他们害怕他会结束这场冷战 ,削减武器费用预算并使“军事工体”这一战争王国受到控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就曾强烈谴责、并警告全国人民要警惕这个专门制造战争的团伙。

在书中 ,约斯滕称奥斯瓦尔德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 ,也曾为中央情报局效力”。奥斯瓦尔德被认为是个可以牺牲掉的家伙 ,因此被当成替罪羊 ,而且为了阻止他向外界提供证据而被干掉了。这样 ,《奥斯瓦尔德·刺客还是替罪羊》这本书就奠定了在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以后三十年中苏联和俄罗斯采取的积极措施中经常出现的两个主题：第一，亨特和其他右翼狂热分子策划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第二，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个阴谋。然而在当时，沃伦报告的出台使这本书失色不少，而约斯滕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暴露则进一步削弱了这本书的影响。

克格勃认为纽约的律师马克·莱恩是第一批研究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阴谋论家当中最有才能的一个，而这种判断是很正确的。一份可能是由纽约情报站编写的关于这个人的报告称：

马克·莱恩以与美国民主党交往甚密而广为人知。他在美国当前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点，并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背景进行了私人调查。

约斯滕称赞莱恩是一位“聪明而勇敢”的人，并称自己撰写的那本书是献给莱恩的：“不管是联邦调查局所使用的‘警察国家的手段（用莱恩自己的话说），还是各大媒体对此事刻意的沉默，都不能动摇他执着地寻求真相。”莱恩与自己的学生助手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第五大道南段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公民调查委员会，他还租下了一个小型剧场，连续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发表后来人们所谓的“演说”，介绍自己的阴谋理论的进展情况。莱恩写道：“这种特别的发表不同意见的办法是必要的，因为所有广播网和电视节目都不允许发表任何与官方观点有只字之差的言论。”虽然纽约情报站不敢冒险与莱恩直接联系，但是它还是通过莱恩的好朋友给他提供了1500美元，资助他的调查工作。莱恩的克格勃档案只说这位朋友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关系。虽然莱恩没有被告知这笔钱的来历，但是情报站认为他也许能猜得到，而且情报站还担心这笔秘密资金可能会

克格勃绝密档案

被联邦调查局发现。

1964年，同一位中间人又为他提供了 500美元，资助他到欧洲旅行。在欧洲，莱恩曾考虑到莫斯科以便讨论他掌握的一些材料。然而中心遗憾地认为邀请他来俄罗斯会过于明显地暴露苏联在插手这件事，于是他去莫斯科的计划被“巧妙地推迟”了。但是克格勃从苏联记者中挑选出了一些可以信赖的关系支持莱恩的调查工作。这些记者中包括克格勃间谍杰里克·博罗维克，此人后来与莱恩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66年莱恩在《草率的判断》书中声称，美国政府最高层中也存在暗杀肯尼迪事件的同谋。该书在当年登上了最畅销精装书的排行榜，并在第二年成了全美最畅销的简装书，而且正像莱恩谦虚地形容的那样，“它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导致“人们对暗杀事件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60年代末至 70年代初，莱恩的成功不像以前那么巨大了。最受人们欢迎的有关行刺肯尼迪事件的书成了那些揭露过分的阴谋理论的作品。1971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莫斯科时，虽然说《草率的判断》这本书“对共产党人有利”，但他也提出，莱恩的主要动机是进行自我标榜。然而到 70年代中期，对尼克松时期白宫里的阴谋戏剧性地被披露，以及中央情报局准备暗杀几位外国政治家的计划的曝光，使阴谋论者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想见，克格勃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实施积极措施的机会，它要通过积极措施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肯尼迪的遇刺与中央情报局有关。克格勃的主要目标是水门事件的同谋之一、前中央情报局官员霍华德·亨特（有时会与得克萨斯石油巨商亨特混淆为同一人）。有人错误地指控在肯尼迪遇刺当天他也在达拉斯。

对霍华德·亨特（代号阿林顿）实施积极措施的主要工具，是一封伪造的奥斯瓦尔德写给他的信。该信据说是在肯尼迪遇

克格勃绝密档案

刺两个星期前写的。信中使用了奥斯瓦尔德在苏联的两年中所写的信中使用过的短语和表达方式 ,巧妙地模仿了他的笔迹 ,并使用了具有他个人特点的、被奥斯瓦尔德经常使用的便于诵读的拼写方法 :

亲爱的亨特先生 :

我希望得到关于我的处境的消息。

我只想了解信息。我建议在我或其他人采取行动前 ,先由我们俩对这个行动进行全面讨论。

谢谢。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显然 , 信中暗示奥斯瓦尔德想在执行暗杀任务前见见亨特。

使用这封信以前 , 克格勃行动技术局三处对它的“真实性”进行了两次检验。1975年这封信的影印版和好心人写的匿名信被寄给三个热衷于阴谋理论的人。这位好心人在信中称他已经把奥斯瓦尔德这封信的原稿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 , 但是看来局长把这封信压了下来。然而 , 几乎过了两年 , 这封伪造的信仍然没有被公开 , 这无疑让中心感到非常失望。1977年 , 这封信终于被退了休的佩恩·琼斯公诸于众 , 琼斯曾是得克萨斯一家新闻小报的业主 , 也曾经出版过自己撰写的四部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书。《纽约时报》报导说 , 三个笔迹专家对这封信进行了鉴别 , 认为是真迹 , 奥斯瓦尔德的遗孀也认出是丈夫的笔迹。众议院暗杀事件特别委员会召集的专家们则更加谨慎一些 , 他们在 1978年称 , 由于找不到这封信的原件 , 他们不能做出“最后结论”。

克格勃绝密档案

然而,让中心感到麻烦的是,新闻界对这封伪造信件的反应主要集中在这封信有没有可能是发给已故的得克萨斯石油大亨亨特(他本来就是中心最初编造的阴谋论的中心人物),而不是克格勃现在选定的目标(水门事件的同谋者霍华德·亨特)这一点上。A局相信中央情报局制定了瓦解克格勃计划的对策。克格勃的报告指出,在美国一场“精心安排”的新闻运动正一个劲地把这件事往(百万富翁)亨特身上扯,以便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奥斯瓦尔德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系上引开。1977年4月,这封信被公开不久,克格勃向中央委员会汇报说它正在实施新的积极措施,揭露所谓的“美国特种部门”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霍华德·亨特在1980年抱怨说:“关于我曾在刺杀肯尼迪事件中扮演过某种角色的说法,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70年代后期,克格勃可以毫不过分地宣称,相信它编造的“肯尼迪的遇刺与右翼势力的阴谋和美国情报界有关”的美国人比仍然接受沃伦委员会的主要发现的人还多。但是,苏联的积极措施并不像中心想象的那样对美国人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一开始所做的掩饰工作可能无意中给那些阴谋论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去相信这件事的确有阴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影响可能比克格勃所做的工作的影响还要大。有时候已经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的阴谋论者们纷纷费尽心思地研究那些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证据。最近刚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沃伦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艾伦·杜勒斯故意向委员会隐瞒了中央情报局曾计划暗杀卡斯特罗的事实。就在肯尼迪遇刺当天,中央情报局给它的一个间谍提供了用来暗杀卡斯特罗的武器。J.埃德加·胡佛也隐瞒了重要情况。他发现,虽然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后曾经给联邦调查局写过要挟信,而且后来还计划到墨西哥城去会见克格勃官员,但是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他的名字并没有包括在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不忠行为的公民的名单上。他的这一发现令他感到非常恐慌。在阅读了一份有关“对奥斯瓦尔德案调查的不足”的报告后，胡佛认为，如果这份报告被公开，那么它将严重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声誉。

杜勒斯和胡佛所隐瞒的这些情况不大可能影响到沃伦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奥斯瓦尔德进行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同谋。但是70年代中期，当这些情况被公之于众时，它不可避免地让人们相信，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被掩盖了，而这表明情报机构可能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此后，水门丑闻和情报机构滥用职权的行为被曝光，这更给阴谋论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虽然情报机构的行为大多是经总统授权或在总统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是人们越来越相信，用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参议院研究与情报活动有关的政府行为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话说，中央情报局“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凶猛的大象”。

A局如饥似渴地抓住了丘奇使用的这一用词不当的比喻。克格勃用来诋毁中央情报局的积极措施中最有价值的财产，是中央情报局驻拉丁美洲的一位满腹怨愤的行动官员，他的名字叫菲利普·阿吉（代号庞特）。1968年他因酗酒、财产管理不善和企图调戏多位美国外交官的妻子而被迫辞职。虽然他一直留在西方，但实际上，他是中央情报局里出现的第一个叛徒。1973年他与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联系，并向它提供了国外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奥列格·卡卢金所谓的“大量关于中央情报局活动情况的情报”。但是多疑的克格勃情报站却因为阿吉提供的情报太好而认为这些情报不是真的，最后还得出结论说，阿吉是中央情报局阴谋的一部分，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据卡卢金称：

克格勃绝密档案

于是阿吉去找古巴人，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古巴人把他提供的情报抄送给了我们。当我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看着有关阿吉提供的情报越来越多的报告时，我就会在心里诅咒我们的官员怎么会丢弃这么好的东西

1975年 1月，阿吉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充满敌意的回忆录，题为《中央情报局内幕：中央情报局日记》。书中揭发了约 250名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员和间谍，并宣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或被中央情报局杀害，或被它和它支持的机构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克格勃在关于这本书的带有自我庆贺色彩的档案中称，该书是“由 A局和古巴同志们共同准备的”。这种说法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米特罗欣所做的记录并没有明确说明克格勃和它的古巴战友（古巴情报处）对阿吉的这部回忆录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据阿吉自己说：“古巴共产党的代表（古巴情报处）……在我不能确定是否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更多的材料时，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阿吉在英国写回忆录时，克格勃通过其新成员——消息报和文学报驻伦敦记者埃德加·阿纳托利耶维奇·切普洛夫与他保持着联系。在 A局的坚持下，在出版之前，阿吉从打印稿中删除了所有关于中央情报局向拉丁美洲共产党组织进行渗透的内容。

由于美国法律方面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内幕》这本书首先在英国出版。它立刻在英国成了畅销书。伦敦《晚间新闻》称它是“一幅描绘腐败、高压、暗杀和阴谋的令人心惊胆寒的图画”。《经济学家》杂志则称之为“非读不可”的作品。或许在 A局看来，最有价值的是前中央情报局驻开罗站站长米莱·科普兰撰写的一篇评论。该评论发表在《观察家》杂志上，称《中央情报局内幕》是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全世界可能出版的描写间谍活动的最详尽的作品”。在一些记者的热心支持下,阿吉开始揭发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站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发现自己家里居然钻出来一些新闻摄影记者,不由大吃一惊。美国一位戏剧导演在一些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家门口演了一出讽刺中央情报局的闹剧。阿吉声称:“有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站变成了大家的笑料。”左派人士、工党国会议员斯坦·纽恩斯向下议院提出了一份议案,他和其他32名同事联名要求撤销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受到阿吉在英国成功事例的鼓舞,欧洲其他地区的媒体也都竞相揭露设立在自己国家首都里的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

《中央情报局内幕》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比英国晚了6个月,而且它在美国还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而这更增添了各媒体对美国的兴趣,并促使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中央情报局内部秘密杂志《情报研究》上刊登的一篇对《中央情报局内幕》的评论,承认它是“对中央情报局一次沉重的打击”:“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必须被从他们正常的岗位上抽调出来,去从事非常繁琐又非常费时的弥补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的工作所遭受的损失的工作……”

1976年11月16日,要求阿吉离开英国的驱逐令使他的案子一下子闹得满城风雨,这使中心感到非常高兴。米特罗欣所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

克格勃采取了坚决的、针对性很强的措施,迫使英国内政部撤销这个决定……伦敦情报站负责具体行动,它发动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工会领导人、非常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和国家记者联合会的领导人反对内政部的这一决定。

克格勃绝密档案

11月 30日 ,反对驱逐令的会议首次在伦敦召开 ,会议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在会上发言的有前工党海外发展部部长朱迪思·哈特、著名工党左派人士伊恩·米卡尔多、电影电视技师联合会成员艾伦·萨帕和著名历史学家 E·P·汤普森。一个总部设在国家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防备委员会积极组织了在内政部前的请愿、集会和封锁等活动。在下议院 ,斯坦·纽恩斯发起了抗议活动 ,这个活动得到了五十多位国会议员的支持 ,他还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会见内政部部长默林·里斯。阿吉在伯明翰、布莱克浦、布赖顿、布里斯托尔、剑桥、卡迪夫、考文垂、伦敦、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举行的对他表示支持的会上发了言。1977年 1、2月间阿吉对驱逐令提出了上诉 ,斯坦·纽恩斯、朱迪思·哈特、前内政部部长埃列克斯·里昂、美国前司法部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曾经给基辛格当过助手的莫顿·哈普莱林和诺贝尔奖得主、联合国驻纳米比亚高级专员肖恩·麦克布里奇都充当了他的品德信誉见证人。哈特和另一位前工党部长巴尔巴·卡斯尔提出了一项动议 ,要求修改上诉程序 ,这项动议得到了 150名国会议员的支持。据阿吉的克格勃档案称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芬兰、挪威、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都掀起了支持庞特的运动。”阿吉上诉失败后 ,5月 3日举行的下议院辩论会是这一场马拉松式的抗议运动的最后一项活动。支持阿吉上诉的瓜尔迪安评论说 :

当默林·里斯裁定菲利普·阿吉和(美国记者)马克·霍森鲍尔必须离开英国时 ,他应该想到这一决定会引起一片哗然。但是他能意识到这种异议所具有的长期性和极端棘手 (征据的篇幅)与争与和平》一书相

克格勃绝密档案

当、诸多新闻发布会以及狂热的证人们举行的游行吗？

虽然阿吉最后还是在 1977年 6月 3日离开英国去了荷兰，但是克格勃仍然为驱逐阿吉事件引起的“极端棘手的异议”而兴奋不已。伦敦情报站声称，它通过工党主要的政治家和其他支持阿吉的人士“指挥”了这场运动，但实际上它极大地夸大了自己的作用。绝大多数支持阿吉的人都不会想到克格勃和古巴情报处与此事有关。

阿吉在广泛的争议声中被英国驱逐后，克格勃仍然利用他和一些支持他的人继续实施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积极措施。阿吉通过他所谓的“匿名通信员”收到的文件中，包括基辛格签署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秘密函件的原件。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中央情报局 1975财政年度准备在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搜集的“主要情报问题”。克格勃的文件显示，这份文件是 A局提供的。1977年夏，这份文件被发表在一份题为《山姆大叔想了解你什么》的小册子上，并附有阿吉撰写的前言。在承认“这并不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文件”的同时，阿吉声称它描述了美国情报部门秘密给予美国海外公司的不正大光明的资助。

1978年开始，阿吉和一小撮支持者开始出版《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用阿吉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通过揭发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及其成员，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一项扰乱中央情报局的运动”。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表明，《简报》是在“克格勃提议下”创办起来的，而且是国外情报局 K局（反间局）组织了这个刊物的运营群体（集体代号卢波尔）。1978年年初这些人在牙买加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华盛顿激进分子比尔·沙普（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卢比）和他的妻子，记者埃伦·雷以及另一名代号为阿塞尼奥的记者路易斯·沃尔夫等三人一起负责《简报》的编辑工作。

克格勃绝密档案

阿吉和另外两个心怀不满的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吉姆和埃尔西·威尔科特（曾被中央情报局分别聘为财政官员和秘书），向《简报》提供了稿件和信息。米特罗欣的记录中并没有证据显示，除了阿吉外，卢波尔小组的成员中还有其他人知道古巴情报处或克格勃参与了这件事。

《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第一期是由阿吉和卢波尔小组于1978年夏天在与哈瓦那狂欢节同时举行的第11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节前夕的一个古巴记者招待会上推出的。阿吉还推出了另外一本著作《肮脏勾当：中央情报局在西欧》的样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他和沃尔夫。书中包括了700名曾被中央情报局派遣到西欧或当时正在西欧活动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和个人生平细节。阿吉写道：“新闻界对此的反应令人满意。在以后几天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大多数主要出版物都刊登了关于《简报》和《肮脏勾当》的文章。太棒了。”

中心从A局和K局抽调人力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小组由A局局长助理V·N·科斯捷林负责协助工作，为《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提供旨在诋毁中央情报局的材料。1979年，它提供的用于出版的材料包括一份长达18页、题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76年至1981年的情报工作远景》的文件。这份文件最初是以匿名方式寄到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基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的家里。当时情报站和中心都错误地认为这是美国情报机构的“诱饵”。阿吉对文件的注释进一步印证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克洛比的抱怨，威廉·克洛比说，最近中央情报局间谍行动的曝光是情报局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是，科斯捷林领导的特别小组发现为《简报》寻找足够的秘密材料的差事越来越难办，于是他们建议杂志更多地使用公开材料，包括读者来信，以及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可以归罪于中央情报局的